



# 卡内基文件

## 用经济地理学 重新诠释 中国的成功

黄育川  
Yukon Huang

---

各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力图使中国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和谐同步，缓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华盛顿特区 • 莫斯科 • 北京 • 贝鲁特 • 布鲁塞尔

亚洲项目

卡内基文件编号115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 2010 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保留所有版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常不以机构身份对公共政策问题发表意见。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表明作者的个人立场，并不代表本基金会、基金会理事或工作人员的观点。

如需转载，请致询：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779 Massachusetts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36  
Tel. +1 202 483 7600  
Fax: +1 202 483 1840  
[www.CarnegieEndowment.org](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

本刊物可免费下载浏览：[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s](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s)

# 目 录

总 结	1
介 绍	2
构建出口导向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	5
邓小平时期汇率所处的地位	10
解决不断萌发的不平衡问题： 空间和福利方面	11
展望未来：政策优先	13
目前我国汇率政策的针对性	15
注 解	19
参考文献和书目	21
作者简介	2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4





## 总 结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近年来，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已投入巨资，意图将国家建设成工业加工和出口强国。为了促进经济更快发展，中国采用了以新经济地理理论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为基础的政策。这一系列理论解释了这个问题：较低的运输成本和经济集聚是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大规模城市化的。

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正面临转折。各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力图令中国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和谐同步，影响下文即将提到的四个主要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汇率形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中国可以成功刺激经济，并建立一套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使人民币能够根据市场的压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辅助工具的话，以下四个政策性问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答：

- **中国将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增长，是出口、投资、抑或消费？**  
这三者之间将形成一个平衡关系。工资和消费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将增加，而投资比重将会下降，这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盈余的增长将会减缓但依旧保持增长状态。
- **未来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会放缓？**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和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可能降低；但如果中国能够提高生产率，提振消费，这种下降将会是缓和的。这一结果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对劳动者有利。
- **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渐移至内地，贫困的农村居民将会迁移到城市，劳动报酬将有所提高，两极分化现象将会得到抑制。
- **人民币升值，究竟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有利？**目前，人民币汇率一次性的剧烈升值并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要求。只有提高其双向灵活性，才能有利于中国，同时也间接的有利于美国和整个世界。

## 介 绍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而且无论从生态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人口在31个省中的分布都是不平衡的。这为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见方框1）。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经济衰退，1950年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工业活动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东北各省和少数内陆地区。之后经过中央的计划部署，全国秉承更加“平衡”的工业发展政策，将许多大型工业联合企业迁至内陆省份，但却忽视了自然优势。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仍然相当贫困，但按照国际标准，它同时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异常公平的国家。当时，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仔细思考过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历程后，提出并推动执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日后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及其贸易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sup>1</sup>。

这些理论解释了人们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在哪里生产，尤其是解释了东亚各国生产工业产品零部件，运输到中国前来总装，由这一过程诱发的产业内贸易。工业品零部件的跨国生产分工有效利用了规模经济效益，大规模的生产也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

### 方框1.中国经济地理方面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地理从根本上影响着其五千年经济史的形成和人口居住的方式。以国际标准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但是中国20%的国土面积上承载了全国80%的人口。这20%的国土包括富饶的平原地区、主要河流沿岸和沿海的城市区。中国国土可以分为三大区域。首先是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这里面积广大的山区和沙漠并不适宜开展商业活动，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该地区人口多集中在河流流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区（东北的一些省份在一般情况下也被归入中部地区，但有时，政府会将这些省份列为地区开发特殊规划的重点，所以对它们有时需要单独研究讨论）。最后是东部沿海地区，包括11个省份，是中国主要的工商业区，历史上，东部沿海也通过贸易和移民保持着与国外的联系。中国的人口基本上平均分布在这三个区域。

本。总之，这些原理构成了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并解释了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原因。通过这一发展途径，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推动改革时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转变。邓小平主导了经济结构改革，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加工和出口大国。但是，邓小平预见到，中国的改革之路会面临转折。因此，目前我们看到，各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力图使中国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和谐同步，缓和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

各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力图使中国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和谐同步，缓和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

这些力量将影响对中国未来的探讨中，最关键性的四个政策性的问题：

- 未来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会放缓？
- 中国将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增长，是出口、还是投资、抑或是消费？
- 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
- 人民币升值，究竟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有利益？

---

## 方框2.三个“D”的发展

- 第一个“D”指Density，即地区经济活动的密集度，通过单位面积产出与收益进行衡量。因此，这一指标与地区就业率和人口密度关系密切。它是城市化的决定性特征。
- 第二个“D”指Distance，即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两地间流动的难易程度。它不仅仅受到两地间物理距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交通运输形式、完善程度和规章制度的影响。
- 第三个“D”指Division，主要指限制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商品、劳动力和服务流动的政策壁垒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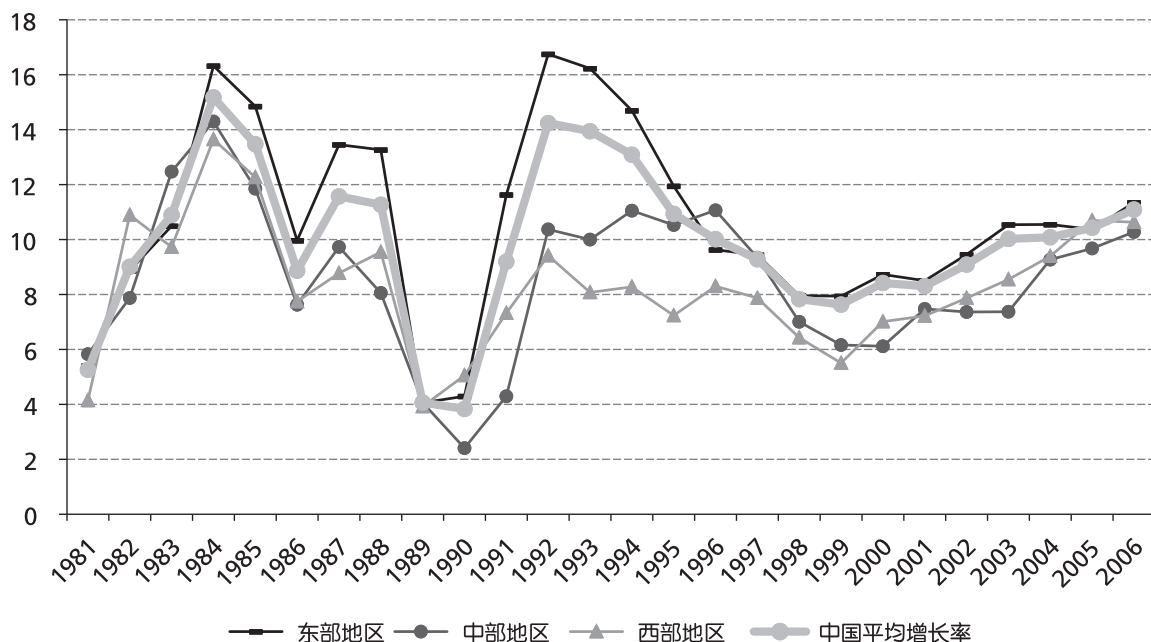
这些问题的答案与支撑中国成功的改革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未来数年的走向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虽然改革有时会出现反复，但这些措施基本符合中国的地理特点和传统优势。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虽然改革有时会出现反复，但这些措施基本符合中国的地理特点和传统优势。

这些改革政策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1）在地区集中度和城乡动态两方面，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形态；（2）破除了束缚各省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本和商品流动的枷锁；（3）但同时，这些政策也加剧了各省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建立了富有竞争力的贸易导向型经济形态，成功解决了经济发展中“三个D”的问题（见方框2）。“中国通过将生产部门集中在便于开展出口的沿海城市，增加了经济活动的密集度（Density）……通过发展交通运输业缩短了市场间的距离（Distance）……破除阻碍商品流通的障碍，减少了分割的情况（Division）（Huang 2010）”中国从“聚集经济”中获得了好处<sup>2</sup>。因此，中国的成功，源自主要中心城市密集的经济活动；源自齐心协力地克服距离因素，对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

表1.中国GDP年增长率, 1981-2006 (百分率)



来源: Huang and Luo 2009

改善；同时还源自对国际和国内影响劳动力和商品流动障碍的破除，增强了劳动力和商品在行政区划之间的流动性，为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sup>3</sup>

## 构建出口导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从那时直到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并使5亿人口成功脱贫。以大规模改革为标志，中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明显分为几个阶段（见表1）。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都被记录在案。80年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的发展，经济迅速增长；90

表2.中国的经济特区从开始的沿海区域发展到其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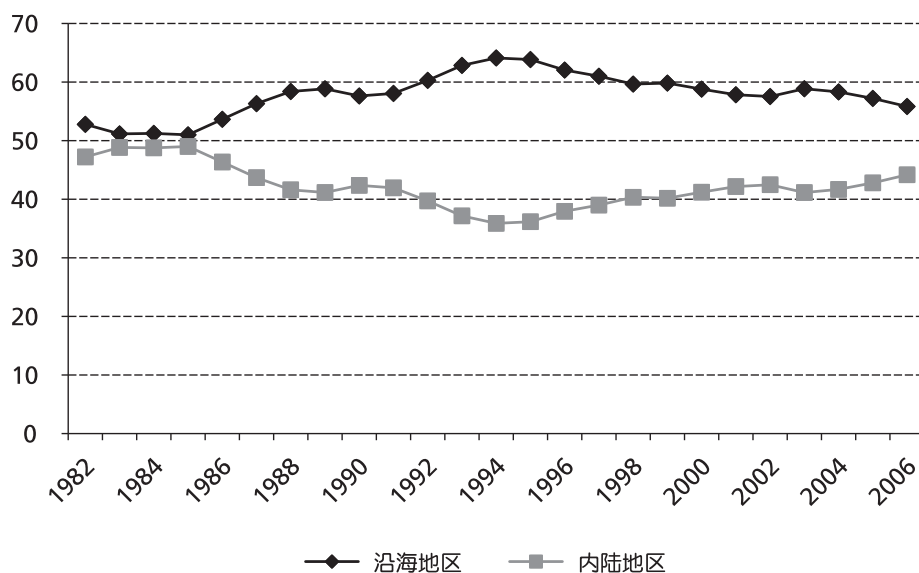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 2007



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发展 and 国有企业的改制拉开了以城市为基础，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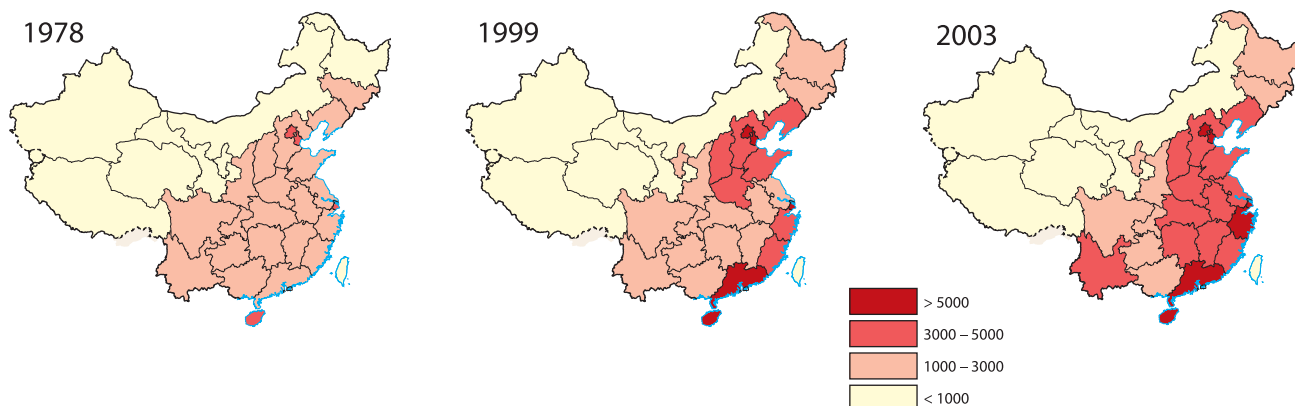
城市化过程是中国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受到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特殊国情的影响。向市场经济的转向最初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这一政策改善了沿海省份的投资环境。在80年代，广东和福建的4个城市建立了首批经济特区（见表2），后来这一模式扩展到了其他沿海省份的城市，并且最终在90年代发展到所有的省会城市。90年代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中，重申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迅猛发展。“梯度发展模式”将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三个经济发展的梯度，并且以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突破口。因此，沿海地区作为改革的先发地区，获得了很大的优势。中国采用“高投入，高出口”的政策，以沿海地区为中心，促进来料加工贸易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贸易和投资不仅仅为沿海地区提供了资本，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了生产力。至2005年，沿海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额

表3. 中国沿海地区资金投入增加, 1982-2006 (百分率)



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表4.为满足发展需求而不断拓展的中国高速公路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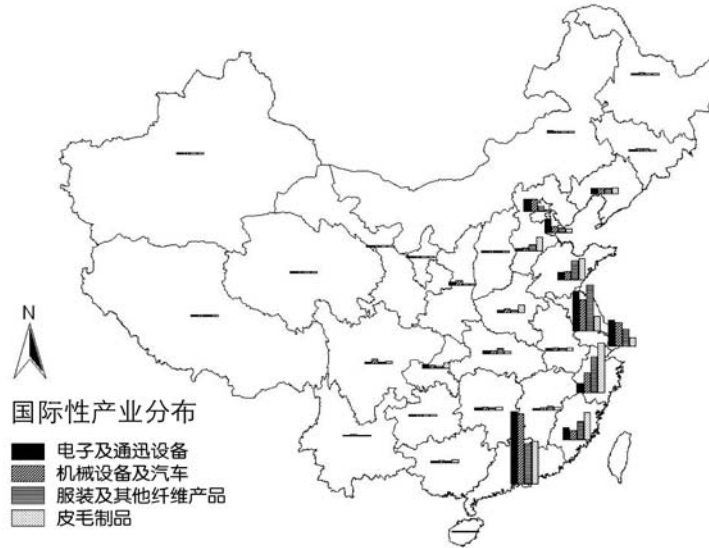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 2007

的90%，吸引了85%的外商直接投资（到目前为止，年投资超过七百亿美元）。沿海地区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优惠的政策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然而西部地区却被远远的甩在后面。

财政政策的转变也为对外开放提供了支持，尽管当时的财政政策与现代要求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它的确在改革初期为沿海的广东省和福建省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优惠。由于国家倾向于对金融实力更强的省份进行投资，因此，投入沿海省份的财政公共资本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由80年代中期的50%提高到了90年代中期的65%（见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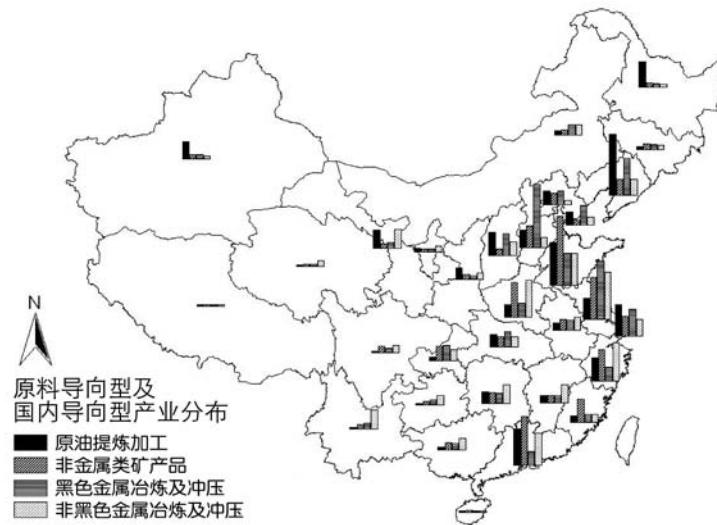
财政投入的增加，促进了中国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建设，最初是沿海地区，其后逐渐扩展至内地（见表4）。这明显缩短了沿海与内陆主要市场的有效距离，并且引入了竞争，有效改造了省际工业结构。通过削减制成品最终价格中包含的运输成本，将主要生产中心同国内外消费市场连接了起来。每年，中国投入交通建设的资金超过GDP的5%（近几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基数，即使以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投资规模都是空前的。在90年代初期，人们也很注重提升沿海城市的物流服务，以此来提高与海外的联系程度。2000年以来，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也获得了更多的投资，例如，1999-2004年，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里程增加了45%，相比之下，同时期沿海地区却只增加了30%。

表5.国际化产业在中国的分布, 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



来源: He 2009

表6.以资源为基础, 国内导向型产业在中国的更加广泛的分布



来源: He 2009





成了大量的流动劳动力群体，这一群体的人口目前估计有1.5亿到1.8亿人。这一群体跨地区流动，聚集在主要的商业流通中心，如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长江三角洲（上海）和环渤海三角洲（北京、天津）（详见表7）。

受对外开放政策，特定财政优惠政策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出现了变化。这促使竞争性产业集聚在沿海地区，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市场一体化使生产更加专业化、集约化，提高了部门内的生产率，使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更趋合理。随着沿海城市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就业量的快速增加、企业在多方压力下为提高竞争力进行的结构调整、以及内部和外部财政状况的大幅改善，沿海地区因此获得了更多效益。这些都为中国的一系列行动获得广泛支持打下了基础：推动贸易自由化，在90年代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打破与外部隔绝的壁垒。从中国贸易量占GDP的比重看，1978年仅为10%，而目前达到了70%以上，可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逐步加快，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法定贸易加权关税从1992年的40%下降到了目前的7%左右。

## 邓小平时期汇率所处的地位

中国贸易收支额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非汇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执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早期，中国采取的是多元汇率制，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汇率。这么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汇率的普遍高估，从非官方市场较高的美元汇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像许多东亚国家一样，中国不是依靠改变汇率来发出价格信号，而是用一系列复杂的财政和行政政策优惠来鼓励出口。因此，在当时的大多数时候，虽然中国努力提高出口能力，但官方汇率并不是刺激经济的手段，人民币的价值也被高估了。

直到2003-2004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才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而非高估。在1990-2005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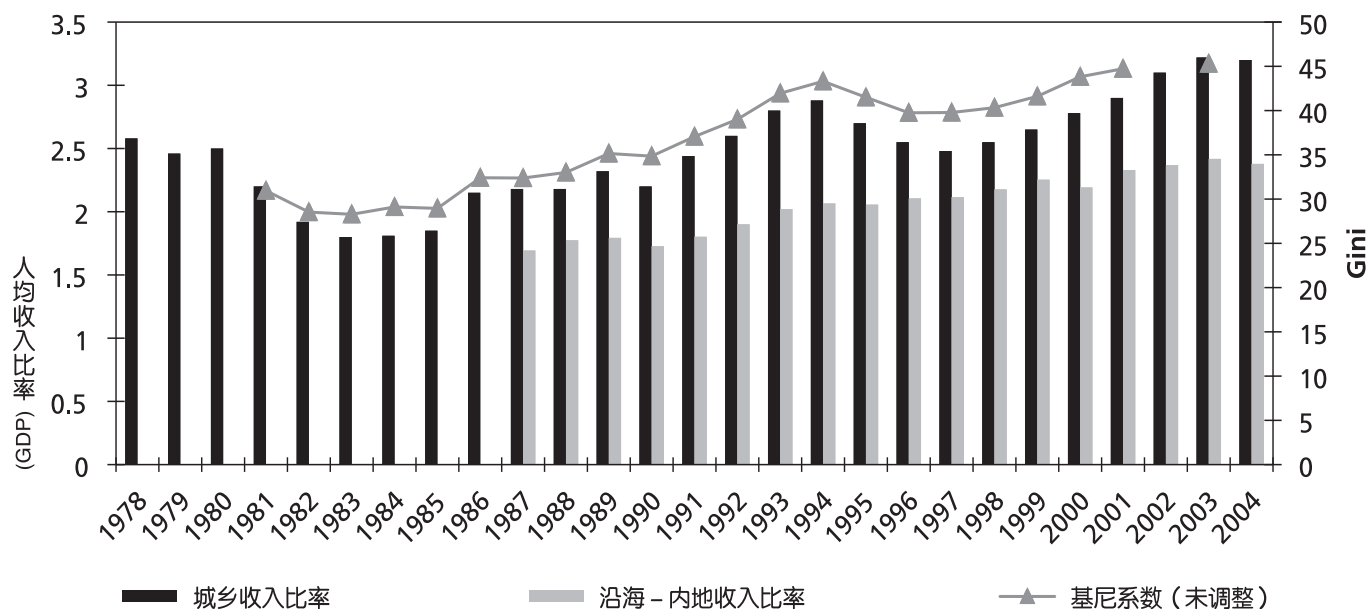
尽管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贸易顺差，但顺差尚比较适度。考虑到贸易占GDP比率的不断增加，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储备体系以应对冲击。然而讽刺的是，中国在2005-2008年期间，迫于全球的政治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非但没有减少贸易盈余，反而使其出现了增长。直到2008年人民币重新钉住美元，中国的贸易盈余才出现了下降。这表明，中国贸易收支额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非汇率。从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为看，影响储蓄和投资政策的因素对贸易平衡的作用相较于汇率的影响更大，对于目前贸易紧张关系的焦点问题——中美贸易流动——则更是如此（如下文所述）。

## 解决不断萌发的不平衡问题： 空间和福利方面

尽管中国的发展经历可圈可点，但是有意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导致了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地区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沿海与内陆省份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及农村

尽管中国的发展经历可圈可点，但是有意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导致了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8. 中国不平衡的收入情况, 1978-2004



来源: Huang and Luo 2009

内部，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差距并不是由某些产业发展停滞造成，而是沿海地区及城市显著的高速持续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的25年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约30升至45，增幅接近50%（见表8）。目前，城市居民人均收入（GDP）超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倍多，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GDP）也是西部地区的两倍以上。从农村经济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和基尼系数上升的部分原因。过去的25年，农村居民收入以每年4%-5%的速度增加；以国际标准衡量，这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但这一比率却只是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因此，即使是在农民收入猛增的这些时期，城乡收入差距也没能缩小：80年代早期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中期的土地市场改革；近期农村税收的优惠措施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都没能弥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许多研究将这种不平衡归因于地区差异或省内因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相较于富裕的沿海地区，相对贫穷省份的城乡差异却更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与这些地区各自的农村情况不同有关，同时与所在省份之间城市化进度不平衡也有关系。省份之间、农村间和城市间的不平衡共同造就了中国经济整体的两极分化（世界银行2009）。农村的两极分化情况依旧比城市严重，但是由于集聚效应的影响，近年来城市的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考虑到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合发展农业，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分散孤立的居民点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成本，由于西部省份城乡结构性差距较大，因此，地区因素当然也会对此一差异产生影响。

---

近期，应该慎重考虑通过将农业生产率提高至与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相当的水平，以减小城乡差距的措施。

---

中国先后于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策略，最近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设想，政府的这些区域发展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目前尚不清楚。但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可以发现，地区投资增长模式更加平衡，内陆省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明显改善。这些进展可以归功于贸易和农业改革，减少了对农业的压力。然而，考虑到地区禀赋的差异和成本效率的要求，近期，应该慎重考虑通过将农业生产率提高至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当的水平，以减小城乡差距的措施。

以非收入指标或社会指标来衡量，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中国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预想的情况。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测算）一直在持续增长。然而，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农村地区文盲人口比例大约是城市地区的3倍，农村地区儿童和产妇死亡率也是城市地区的两倍。而且，在相对贫困的省份，尤其是西部地区，城乡间非收入指标的差异更为明显。随着人们逐步意识到地区间的差异，地区之间基础教育程度的差距正在减小。然而，自从90年代末以来，由于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加上农村地区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缓慢，城乡间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

要解决长期存在的福利差异，仍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扶持，任重而道远。虽然政府为减轻地区间两极分化的现象，在1995年开始下拨平衡补助拨款，但取得的成效却不甚明显。在城市地区，平均每位小学生的教育拨款要高出农村地区50%，一些欠发达省份并没有能系统地获得更多中央拨款。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央财政分配制度改革，还要改革政府社会支出向地方一级的分配体制。

## 展望未来：政策优先

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发展将逐渐融为一体。区位优势虽然可能会被削弱，但依然存在，加上集聚效应的影响，东部沿海那些更大、全球化融合程度更高城市地区依旧占有优势。考虑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带来的公众压力，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应该是什么？

理论和实践情况都表明，政府不应试图促使各地区之间达到“生产力平衡分布”的状态。然而，基于从前的成功经验，为弥合沿海与内陆省份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福利差距”而实施的政策，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 强化财政分配体系建设，使各地区和城乡地区都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这样也可以减少在贫困地区，因财力有限对公共投资项目形成的限制；(2) 消除法规和制度上对劳动力、资本和商品流动的限制，并且加强基础设施和物流设施建设，使各地区和城乡之间联系更加密切。(3) 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制订具有地方特色、利用地区优势的发展政策。例如，



对西部地区来说，要认识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强化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鼓励企业进行更彻底的结构重组，并继续发扬农业优势；对于中部地区，由于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国内市场，商业活动内化至主要中心城市，因此需要加强多式联运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贯穿这些问题的政策主线，应当是更灵活的国内劳动力迁移政策。虽然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定有所松动，但对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外来家庭来说，他们依然没有在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获得平等的待遇。然而，许多外来人员的户口<sup>5</sup>还在家乡，他们拥有那里耕地的使用权。在没有正式的土地市场的情况下，在城市中外来劳动者的居住问题引发了大量争议，而且这一问题难以解决。解决城乡两极分化的问题，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革居民户口制度。当然，户口制度在防止城市出现类似其他亚洲城市的贫民窟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而非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此缓解社会压力，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解决城乡两极分化的问题，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革居民户口制度。

---

由于担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难以管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不情愿改革户口制度。自改革开始的25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目前已经接近总人口的50%。尽管中国的城市面临很多环境问题，而且交通运输系统亟需改善，但在城市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集聚效应仍然压倒了负面的拥挤效应。与目前盛行的观点相悖的是，从其人口和面积来看，实际上中国的主要城市规模是太小，而非太大(Bertaud et al. 2007)。只有在人口、经济、环境等方面均发展到较高程度的情况下，采取在原有城市周边建立“二线”城市的做法才有可能奏效。由于中国城市发展多采用典型的环状建设方式，城市空间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例如，一些城市中存在农业用地和闲置地块，但是城市的其他地方仍在不断建设），无谓地增加了城市的交通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由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所以中国需要制定更有效的城镇规划，对迄今为止城市内部的“空隙”进行填充式开发。

第二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经过1994年的税收制度改革，原本可根据情况自由决定的收入分享体系被一个更规范的财政分配体系所取代，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进行重新分配。虽然自此之后，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从90年代中期占GDP的10%增至目前的占GDP25%；但是这一财政制度在促进平等获得社会服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依然较小，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经费分配方法，在分配到地方的时候并没有提供相应比较的资金。国家以下各级部门的支出超过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二，从国际标准来看这是相当高的；而由于中国各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因此按照准确的收支比例将经费分配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对相对贫困的内陆省份尤其如此，这也能为这些地区的城乡差异比沿海地区更大提供部分解释。

---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所以中国需要制定更有效的城镇规划。

---

政府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总结起来就是，这些政策的采用将提高由于高密度（DENSITY）带来的贸易集聚利益，减小阻碍有效经济活动分布的距离（DISTANCE），以及突破限制生产要素流通和可持续发展生产的隔阂（DIVISION）。中国政府解决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方式，将对未来经济活动的分布、社会的两极分化情况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

## 目前我国汇率政策的针对性

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可能会迷惑不解，为何需要令人民币升值，以减缓美中贸易逆差。他可能会像目前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一样，重申中国在完善其金融体制的同时，也正在逐步建立一套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但他还会强调，中国目前正面临一系列更加重要的问题，而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并非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25年来，中国通过调整其经济地理结构，建立了贸易导向型的生产结构。由于制度、价格以及财政方面的优惠措施，中国重新布局了工业，使其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但目前这种趋势正在改变，中国未来的将会转变为国内导向和消费驱动型经济体，这将对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尽管一套更灵活的汇率体系将有助于发展，但如下文所述，汇率剧烈波动和单方面升值是弊大于利的。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中国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保持经济较快发展。但是，伴随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收入两极分化的加剧，令中国领导人颇感棘手。尽管中国成功的提高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但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也开始加剧。因此，中国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并以以下三点为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1）增加就业；（2）减小居民收入差距；（3）增加国家财政收支的可控性。

近期颁布的鼓励涉及消费投资的政策，使得平衡这三个目标更加困难。虽然这些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使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明显下降。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不仅不符合要求，而且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三个目标，必须建立一个更倾向于国内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并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活动分配更加平衡，那么这些目标就更容易实现。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提出了发展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战略规划，同时制定了面向广大农村的社会发展项目，这些举措正在刺激消费，意在使消费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出现上升。

---

欧美对东亚出口商品的需求毕竟有限，所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转向由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驱动经济发展的道路。

---

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快速的城市化和老龄人口的增加，消费水平将会提高，服务的需求量也将激增。服务业的就业潜力很大，而中国传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并不高；充满朝气的服务业将会减少中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赖。另外，欧美对东亚出口商品的需求毕竟有限，所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转向由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驱动经济发展的道路。

可能并非政府刻意为之，但是中国稳定的汇率政策一直在推进经济改革。在固定的汇率下，庞大的收支盈余使得沿海城市工资和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陆地区（见表9）。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提高，伴随着市场间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少，使得沿海企业正逐渐向内陆地区迁移。如果某一行业主要面向国内而非国际，并且对发达城市的多种服务措施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一行业的企业就更有可能向内地迁移。企业的这种位置上的“重整”是由较高的成本和变化的需求导致的，而不是像毛泽东主导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仅仅因为地理位置的平衡就进行迁移。



表9.中国各地区固定年份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百分比)

地 区	1997-2001	2002-2008
中部地区	8.0	9.4
西部地区	7.7	8.6
东部地区	6.5	10.2

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不断上升，生产企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些都会减轻两极分化现象。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推动改革时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转变，他很清楚，内陆和沿海的收入差距在一开始会扩大，但最终会慢慢变小。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在1990-2000年间，沿海省份的GDP增长远远超过内陆省份，但在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内陆省份发展速度已经开始超过沿海省份。

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这一转变深化发展吗？由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没有地区差异性，因此不大可能促使企业向内陆迁移。与此相反，最近在不同地区出现了通货膨胀，由于通胀的压力，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都有所上涨，反而成了企业向内陆地区迁移的动力。同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和管理实践方面刚刚起步开始追赶沿海地区，而且之前更高的人民币汇率加大了它们与沿海地区竞争的难度。这些省份大多以农业为主，对规模经济的依赖更小。对于沿海地区适用的汇率并不适用于内陆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减少物流费用，以此抵消改革初期过分专注于沿海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差距。

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一剂“猛药”，它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而且它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将远远超过目前的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不仅如此，它还会影响中国为刺激经济所作的努力，而这些努力不仅仅有利于中国，同时也有利于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但是，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辅助性工具，中国政府也需建立一套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使人民币能够根据市场的压力进行适当的调整。

但是，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辅助性工具，中国政府也需建立一套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使人民币能够根据市场的压力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中国取得了成功，那么接下来的改革将对本文开篇提出的四个问题做出解答：

- **中国将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增长，是出口、投资、抑或消费？**这三者之间将形成一个平衡关系。工资和消费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将增加，而投资比重将会下降，这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盈余的增长将会减缓但依旧保持增长状态。
- **未来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会放缓？**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和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可能降低；但如果中国能够提高生产率，提振消费，这种下降将会是缓和的。这一结果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对劳动者有利。
- **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渐移至内地，贫困的农村居民将会迁移到城市，劳动报酬将有所提高，两极分化现象将会得到抑制。
- **人民币升值，究竟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有利？**目前，人民币汇率一次性的剧烈升值并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要求。只有提高其双向灵活性，才能有利于中国，同时也间接的有利于美国和整个世界。

## 注 解

1. 这些理论是帮助保尔·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理论。
2. 集聚经济是指当经济代理集中在一个特定地区时，从企业、劳动及与知识相关活动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的动态利益。
3. 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支撑理论，三D概念，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详见 Huang and Luo 2009。
4. 登陆<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查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文件和人类发展报告。
5. 户口是家庭登记的一种制度。它能证明一个人的正式居住地点，并且能为人们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以及包括房屋与土地使用的其他权利。变更一个人的正式居住地点，由地方当局严格控制。大多数移民工(农民工)没有户口，就没有为当地居民服务或者被雇佣的权利。这给他们的家庭或者工作变动带来更大的困难。



## 参考文献和书目

- Bertaud, A., D. Webster, J. Cai, Z. Yang, 和 A. Gulbrandson: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问题与政策建议。” 未发表文章, 世界银行, 2007。
- Bhattasalli, Deepak, Shantong Li, 和 Will Martin 合编: 中国和世贸组织。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4年。
- Bourguignon, François: “从历史的视角看增长, 不平等和财政政策: 中国是否有历史借鉴?” ; 《中国的公共财政: 为建设和谐社会而进行的改革与发展》, Jiwei Lou 和 Shulin Wang 合编。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8。
- Catin, M., X. Luo, 和 C. Van Huffel: 中国的开放性、工业化及商业活动地理集中化。政策研究工作文件3706。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5年。
- Chen, Zhao 和 Ming Lu: “中国是在牺牲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地区间和城乡发展吗?” ; 东亚地区经济活动地理分布重塑, Yukon Huang 和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合编。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 Dollar, David, 和 Bert Hofman: “政府间财政改革, 支出分配和政府治理。” ; 《中国的公共财政: 为建设和谐社会而进行的改革与发展》, Jiwei Lou 和 Shulin Wang 合编。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8。
- 经济学家: “公路, 铁路和航空齐头并进: 中国的基础设施大跃进。” 2010年2月16日。
- He, Canfei: “中国转型期产业集聚与经济情况。” ; 《重塑东亚地区经济地理分布情况》, Yukon Huang 和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合编。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 Huang, Jikun, Yu Liu, Will Martin, 和 Scott Rozelle: “农业贸易改革和农村繁荣: 从中国借鉴成功经验” 未出版论文, 世界银行, 2007
- Huang, Yukon: “关注的沿海地区, 而不是它的货币。” 金融时报, 2010年8月10日, <http://www.ft.com/cms/s/0/2c1c83c2-a4b4-11df-8c9f-00144feabdc0.html>.

Huang, Yukon 和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重塑东亚地区经济活动地理分布》,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Huang, Yukon, 和 Xubei Luo: “重塑中国经济活动地理分布”; 《重塑东亚地区经济活动地理分布》, Yukon Huang 和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合编;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Li, Shantong 和 Zhaoyuan Xu: “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转变趋势。”未发表文件,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东京, 2007年。

Lou, Jiwei: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经验教训。”; 《公共财政在中国: 改革和建设和谐社会》, Jiwei Lou和Shulin Wang合编。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8。

Lou, Jiwei 和 Shulin Wang合编: 《中国的公共财政: 为建设和谐社会而进行的改革与发展》,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8。

Luo, Xubei. “La mesure de la distance dans le modèle de gravité: Une application au commerce des provinces chinoises avec le Japon.” *Région et Développement* 13, 2001: 163 - 180.

———.《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3345。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4年。

———.《增长的溢出效应与区域发展模式: 中国各省案例》, 政策研究工作文件3652。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5年。

Ma, J., 和 J. Norregaard: “中国的财政分权。”未发表的文件。华盛顿特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8年。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纽约: 联合国, 2009年。

Wang, S: “中国1994年的财政改革: 初步的评估。”亚洲调查37, 9号文件, 9月9日1997: 801-817页。

世界银行: 2007年中国交通运输部审查。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7年。

———2009年中国贫困评估。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Yao, Yang.杨要, “中国政府为解决地区性差距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 重塑东亚地区经济活动地理分布, Yukon Huang 和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 合编;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9年。

Yusuf, Shahid 和 Kaoru Nabeshima 在 China Urbanizes, 上发表的“优化城市发展” Shahid Yusuf 和 Tony Saich合编,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8。

---

## 作者简介

黄育川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1992年至1997年，黄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的局长。1997年至2004年，他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此前，他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国家援助战略”项目主管。他还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并在美国、坦桑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多所大学任教。

黄育川出版、发表了大量阐述发展问题的著作和文章。最近，他与人合作编写了《东亚视野》一书。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汇集了著名亚洲学者撰写的阐述亚洲地区前景的论文。此外，他刚刚完成的《重塑东亚经济地理》一书也已于近期出版。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非营利的民间组织，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其工作的开展讲求实效性，且不受任何党派控制。

正拓展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智库的卡内基基金会，运营于中国、中东、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这五个地点涵盖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及其政治发展与国际政策将对国际和平与经济发展前景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

---

卡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在北京和华盛顿特区，为政策制定者在亚太地区复杂的经济、安全、政治发展问题上提供明晰准确的分析。